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追梦与幻灭： 报人成舍我研究

Zhuimeng Yu Huanmie:
Baoren Cheng Shewo Yanjiu

黄志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追梦与幻灭： 报人成舍我研究

Zhuimeng Yu Huanmie :
Baoren Cheng Shewo Yanjiu

黄志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梦与幻灭：报人成舍我研究 / 黄志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 - 7 - 5161 - 9344 - 0

I. ①追… II. ①黄… III. ①成舍我 (1898 - 1991)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082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许 琳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70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黄志辉博士的大作《追梦与幻灭：报人成舍我研究》出版了。这是他穷五年精力孜孜以求的硕果。翻看每章每节都可见珠玑纷呈、琳琅满目，让人爱不释手。

对一个个鲜活的著名新闻界人物展开研究是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这种研究，能更清晰地展现新闻观念、新闻业务和经营理念的演进。研究中国新闻界的历史人物，可以探索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可以找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殊规律。

成舍我有着近80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他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都创办过报纸，因而研究成舍我的意义自不待言。但各地研究成舍我者众多，对已有研究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实属不易，仅图书就有100来种之多，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况成舍我创办和工作过的报刊不下16家，这些报刊不一一阅看，谈不上会有深入的研究；成舍我写过的文章、日记和他的演讲，更是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他一生笔耕不辍，但他认为他的报章文字，应时第一，没有重行阅读的价值，而不同意结集出版，这又为研究增添了难度；他的同事、故人、亲朋好友、学生及其他接触过的人，他们有关成舍我的文章，同样繁多且驳杂；分散于北京、上海、重庆、台湾等地的相关档案，同样查找不易，费时费力费钱。虽然各种数据库的面世，给了我们很多前人想象不到的方便，但仍有一些是数据库和网络上查找不到的。黄志辉博士自费上北京，下台湾，多方搜寻各种相关史料，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每当他发现一点前人还没发现的或还没发表过的有用材料，他每每第一时间同我分享，当时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至今历历在目。

黄志辉博士认为：新闻史人物研究，一方面借鉴“兰克式的、实证主义模式”，注重史料的搜集和核实，努力还原人物的人生轨迹；一方面借鉴“年鉴派的、综合主义的模式”，通过各种途径去解释史料，努力达到

不仅要叙述“是什么”，还要分析说明“为什么、有何影响”，即用史料综合阐释人物的内心世界，包括他是如何走上新闻业道路的？他的政治思想、新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两者又有无必然的关联？在职业生涯中又碰到过哪些危机？对其事业又有何种影响？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研究各种史料的时候，他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然后加以仔仔细细地分析，得出解决问题的结论。因而我以为，该书史料丰富翔实，论据充分，论证严谨，所得结论令人首肯。这是一本难得的史论专著。字数不是很多，但给人沉甸甸的厚重感。

成舍我作为具有“好言功利”性格的民族资产阶级报人，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沉陷政治纷争。但他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和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又使他在新闻界具有较高的声望和影响。成为中国的报业大王，组建中国的报业托拉斯之梦，成为他大半生的执着追求，“如飞蛾扑火般地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站起，其悲壮直可使每一个从事新闻业的人感叹不已，然而中国近现代的政经之路，注定了他的梦想终将幻灭”。

掩卷而思，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近现代中国多少仁人志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借鉴各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坚持这一原则，我国的新闻事业必将迎来健康康、蓬蓬勃勃的更大发展。

许清茂

2015年12月18日草于厦门大学北村

目 录

引论 中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与成舍我研究	(1)
一 人物研究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	(1)
二 成舍我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独树一帜的报人	(7)
三 成舍我研究文献回顾	(9)
四 本书的研究思路及章节架构	(37)
第一章 “惨绿少年”：新闻精神的孕育	(40)
第一节 “立志做新闻记者”	(40)
第二节 任职上海《民国日报》与“问政”意识的初步锤炼	(46)
第三节 加入南社与“南社内讧”事件	(56)
一 加入南社	(56)
二 成舍我与“南社内讧”事件	(61)
第四节 求学北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成舍我	(70)
一 求学北大	(70)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成舍我	(73)
第二章 “‘世界’与‘民生’辉映”：《世界日报》系和 《民生报》	(81)
第一节 成舍我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	(81)
第二节 《世界日报》系	(95)
一 启航《世界晚报》	(95)
二 《世界日报》的创办及其办报特色	(101)

第三节 《民生报》发刊日考	(135)
一 关于发刊日的几种说法	(136)
二 对发刊日的辩证	(138)
第四节 “五洲未定一年游”：对成舍我 20 世纪 30 年代初欧美 远游的考察	(142)
一 欧美远游的缘起	(143)
二 欧美远游的行程	(146)
三 欧美远游的影响	(149)
第五节 《民生报》停刊事件：中国言论斗争史上的典型 案例	(154)
一 事件全扫描	(155)
二 事件原因分析	(162)
三 事件的影响	(170)
 第三章 “大众化报纸新革命”：小型报上海《立报》	(173)
第一节 成舍我的大众化报纸思想	(173)
一 大众化报纸思想的形成	(175)
二 大众化报纸思想的内涵	(178)
三 大众化报纸的实践：小型报办报策略	(182)
第二节 小型报的杰出代表：上海《立报》	(185)
一 《立报》的创刊	(185)
二 精编主义编辑原则	(189)
三 “在本报销达十万份之前，不载广告”	(198)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上海《立报》	(202)
一 “一二·九”运动中的宣传	(203)
二 曹聚仁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的报道	(208)
 第四章 “纵横万里半坵墟”：战争与和平	(217)
第一节 辗转万里中的思想剧变	(217)
一 “好言功利”的性格	(218)
二 民族危机中的选择	(220)

三 组建中国报业托拉斯的追求	(225)
第二节 国共和谈期间《世界日报》的政治倾向分析	(231)
一 反对内战、呼唤和平统一	(232)
二 对国共两党的评判及立场	(235)
三 鼓吹“第三条道路”	(239)
第三节 战时新闻思想	(243)
一 战时宣传思想	(244)
二 战后新闻制度的规划	(247)
第五章 “隔洋此日梦垂念”：从“北平世新”到“台湾世新”	(256)
第一节 “北平世新”创办动因探析	(256)
一 成舍我早年的新闻实践活动是其兴办新闻学校的动因之一	(258)
二 此时形成的报刊思想是成舍我兴办“北平世新”的另一动因	(262)
第二节 “台湾世新”的创办及成舍我的教育思想	(266)
一 “台湾世新”的创办	(266)
二 新闻教育思想	(270)
三 办学理念	(275)
第六章 “壮志未遂双鬓白”：在台湾的报业活动	(282)
第一节 “戒严”期间争夺“办报”权利的争斗	(282)
一 “戒严”期间“办报”活动的尝试	(284)
二 “戒严”期间“办报”不成之原因分析	(286)
第二节 报禁解除与《台湾立报》的创办	(298)
一 报禁解除	(298)
二 报禁解除前夕成舍我对报业解禁后的展望与《台湾立报》的创办	(300)
第三节 《台湾立报》何以难“立”？	(303)
一 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台湾立报》难“立”的客观原因	(303)

二 新闻理念及经营方式不能与时俱进是《台湾立报》难 “立”的主观原因	(309)
余论 中国近现代报人的生存图景与成舍我报业托拉斯之路的 破产	(321)
参考文献	(330)
后记	(350)

引论

中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与成舍我研究

一 人物研究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中国新闻事业由近代向现代迈进的转折中，有一大群新闻工作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因他们的贡献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璀璨生辉的名字。他们或因新闻理念，或因新闻采写，或因经营管理，冲出了旧的新闻业的藩篱，莫立了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基本疆域。对一个个鲜活的新闻人物展开研究能更清晰地展现新闻观念、新闻业务和经营理念的演进，从此层意义上说，人物研究应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人物研究并没有付诸应有的重视。据一位学者的观点，“这一时期，已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中，往往只强调报纸在‘宣传’‘组织’‘鼓动’活动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作用，很少提到个人。能够列名于近、现、当代新闻史中的人物屈指可数。对历史上的名记者、名编辑、名报人的研究严重缺失”。^①

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的学者不断呼吁加强对新闻人物的研究。例如，大陆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多次指出，“研究报刊史，必须研究每一个在新闻战线有过贡献、产生过影响的报刊工作者活动的历史，他们的丰富的办报经验，他们的文字风格，他们的新闻手法等等，都值得下功夫去研究”。^②

① 乔云霞：《60年来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现状及对策》，《新闻春秋》（第12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8页。

② 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类似的呼吁见《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花枝春满 蝶舞蜂喧——记1978年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新中国五十年来新闻史研究》，《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7、92页。

又如，我国台湾地区新闻史学者朱传誉说：“我们也有不少名报人，办了不少的名报刊。他们的贡献，应该记录，他们的心得和经验，值得我们吸收和参考，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效法，他们的经历，是我们传播事业史的一部分，尤应设法保存留传。”^①因而，他认为，中国新闻史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报人传记的编撰，“一个有名的报人，他所创办的报纸，常对整个新闻事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个人的历史，往往可列为新闻史的一部分”。^②

在上述学者的呼吁下，随着新闻史自身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新闻史人物研究自此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方汉奇举出姓名的近代报人，就不下1500人，对其中知名度较高、贡献较大的，还设置了专节或专目，作进一步的详细介绍。同时，我国台湾地区的赖光临以“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为题，以人物为中心，重点阐述了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张季鸾等人的报业活动与新闻思想。此后，一些报人在《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学论集》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回忆性的文章，成为现今对旧时报人和刊物展开研究的重要文献。1983年始，新华出版社出版《新闻界人物》丛书，以中国为主，选取对新闻事业有重大贡献的近现代知名人士，全面介绍他们的生平、经历、思想、言行、新闻观点、新闻实践和在新闻史上的作用，至1989年5月，共出版了10本，先后介绍了23名中外新闻界人物，可惜的是此套丛书此后未能连续出版。也是1983年，《中国新闻年鉴》开始增设“中国新闻界名人”专栏，对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每人作500字左右的简介，至1996年累计介绍达1905位，可以说对近现代新闻史上较有名的人物都搜寻无遗。1996年，人民日报出版社联系众多专家编写《中外名记者丛书》，该丛书至1999年共出版了两辑，介绍了23人，除李普曼、斯诺和本多胜一外，其余20人均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人士。该套丛书属于评传性质，既是传记，又是研究性著作，它不是单纯的叙事作品，而是有传有评，评传结合，成为至今尤有借鉴意义的重要文献。

与此同时，中国新闻史学会，作为主要研究力量，以一些历史上深有影

① 朱传誉：《中国新闻事业研究导论》，载朱传誉《报人·报史·报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1页。

② 朱传誉：《我们亟须“中国新闻史”》，载朱传誉《报人·报史·报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0—81页。

响的新闻工作者的纪念活动为契机,与其他主办单位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会后将大部分纪念文章结集出版。代表性的文集有《纪念埃德加·斯诺》(1984年)、《人民新闻家邓拓》(1987年)、《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岁生日纪念文集》(1998年)、《胡政之先生纪念文集》(1998年)、《张友鸾纪念文集》(2000年)、《林白水纪念文集》(2008年)、《埃德加·斯诺:向世界见证中国》(2011年)。

20世纪90年代后,对新闻人物的研究逐渐由初始的资料汇集到编写传记、年谱等纵深方向发展,推动力量也由以往出版社组织的集体力量开始转向学者个人的兴趣爱好,这样看似力量分散了,但是实际上研究成果更丰硕。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至今对下列近现代新闻人物王韬、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张季鸾、戈公振、邹韬奋、范长江、邓拓、王芸生、赵超构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①

总之,30余年来,中国新闻史人物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经过了一

① 关于这些人物的评传有: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鲁正葳:《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华德韩:《邵飘萍传:报业巨子·新闻导师》,杭州出版社1998年版;郭汾阳:《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京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林溪声、张耐冬:《报人时代:邵飘萍与〈京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林蔚君:《我的父亲林白水》,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王植伦:《林白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庞荣棣:《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方舟:《一代报王史量才》,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陈纪滢:《报人张季鸾》,文化图书公司1957年版;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王润泽:《报人时代: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汪丁丁:《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李满星:《张季鸾与民国社会》,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洪惟杰:《戈公振年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穆欣编著:《邹韬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邹华义:《以笔代剑的英雄:邹韬奋》,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俞润生:《邹韬奋传》,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沈谦芳:《邹韬奋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郝丹立:《韬奋新论: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邹韬奋纪念馆编:《邹韬奋研究》(三辑),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马仲扬:《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方蒙:《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徐向明:《范长江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范苏苏、王大龙:《范长江与青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于友:《解读范长江:记者要坚持真理论真话》,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蓝鸿文:《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王必胜:《邓拓评传》,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成美、顾行:《邓拓传》,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庞珣:《邓拓和他的一家》,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朱秀清:《书生豪情:邓拓》,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李辉:《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张帆:《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海天出版社2003年版;李玲:《往事经年归史传:邓拓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宋连生:《邓拓的后十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张林岚:《赵超构传》,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赵则玲:《报界宗师:赵超构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个“从点滴回忆到系统研究”的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①然而关于人物研究的现状也有学者提出了种种批评^②，这些批评都言之有理，但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新闻史人物研究亟待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反思。

其一，史料挖掘问题。

“史学即史科学”的观点虽未必十分正确，可谁也否认不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对于历史研究来说，离开了史料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笔者看来，搜罗一位新闻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可从3方面着手：一是尽可能完备地搜寻他所著的作品。个人往往将他的生平经历、心路历程、思想观点体现于他的著述中，因而个人的著述是研究人物的首要的第一手资料。以往在缺乏数据库的时代，为了较完备地搜寻被研究者的作品，研究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翻阅旧时的报刊，并做好资料卡片和笔记。然而近年来随着“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大型数据库的建成，研究者只需输入各种笔名就能较完备地检录被研究者的作品，如此能大大减少研究者的劳动量。现今环境下学会使用这些数据库是研究新闻史人物的必备素质。二是翻阅他创办或工作过的报刊。新闻史人物研究单单阅读他的作品是不够的，为了对他的新闻思想和业务经验有更明晰的认识，务必要翻阅他创办或工作过的报刊，如此才能对报刊的版面设计、标题制作、消息来源、新闻采写等业务做法有较直观的感受，从中对他的新闻理念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更不用说在翻阅这些发黄的报刊过程中不时能发现久被人遗忘的史料。三是查阅相关的档案资料。档案文献是史料的重要一类，是一种较隐秘的文献，是评判

① 乔云霞：《60年来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现状及对策》，《新闻春秋》（第12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8页。

② 例如乔云霞认为新闻人物研究主要有以下问题：研究死人多活人少；就事论事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不够；重复研究“炒冷饭”多，深入挖掘不够；爱憎由己，不是一把尺子量到底；人物评说等方面，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等等。而樊亚平批评现今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思想、新闻活动、办报特点、历史贡献等的探究与介绍层面，但这些研究感受不到每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处的人生情景和社会情景相应的职业认知、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态度以及很可能存在着的价值、理念、身份、角色等方面的困惑与张力，因而也就看不到作为一种特殊职业群体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在新闻职业道路上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参见乔云霞《60年来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现状及对策》，《新闻春秋》（第12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8页；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人物及报刊政治立场的一种重要佐证材料,可是长久以来一直为我国的新闻史研究者所忽略,由此导致对人物及报刊的评介或沿袭旧说,或牵强附会,乃至自相矛盾。可喜的是,近年来学界逐渐改变这种态度,认识到档案文献是有待开发的富矿,并有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有学者充分挖掘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的文献,对新记《大公报》与蒋介石政府之间的关系,《大公报》的“不卖”原则,王芸生与蒋介石、孔祥熙的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的抗日倾向有了新的考证和论断,引起业界较大的反响。^①随着海峡两岸档案文献的陆续解密,相信新闻史研究应该有不少新的发现,对人物和报刊的评介能推翻不少早已有的论断。

其二,研究方法问题。

利贝卡·鲁宾等人在《传播研究方法:策略与资料来源》中将传播研究的方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信息或人为导向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传播信息本身以及与其关联的态度上;另一类则是人物或行为导向研究,着重于传播行为的研究,包含观察与实验研究。以这种划分为依据,新闻史人物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当然属于第一大类,是要“对过去的传播事件或者传播者,提取有关的结论以及给出新的解释”,因而人物研究从性质上是属于“传记的、运动的或思想的、制度上的、历史案例的”,从属其中的历史性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②因而首先要明确的是,新闻史研究,包括新闻史人物研究当然是历史研究,属于史学的范畴。

自19世纪以来,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两大模式。一种模式称为“兰克式的、实证主义模式”,占据了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主流地位。该模式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认为借助史料和历史家严谨的叙事能够完全、客观地重构历史事实,因而该派注重收集史料,又被

^① 参见俞凡《试论新记〈大公报〉与蒋政府之关系——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5期;俞凡《也谈新记〈大公报〉的“不卖”原则——以20万美元官价外汇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8期;俞凡《青年与政治真的是“违心之作”吗?——谦论王芸生与蒋介石、孔祥熙之关系》,《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6期;俞凡《“九一八”事变后新记〈大公报〉“明耻教战”论考辨——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

^② [美]利贝卡·鲁宾等:《传播研究方法:策略与资料来源》(第四版),黄晓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74页。

称为“考据派”。自20世纪后，这一模式受到挑战，其地位逐渐被“年鉴派的、综合主义的模式”（“新史学”）所取代，该模式否认前一模式通过史料可以重建过去的观点，认为“历史的最高任务不是叙述过去真正发生过的事，而是作出‘科学的解释’”，提倡一种“总体”的概念，主张借助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种学科的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①史学界关于这两大模式孰优孰劣的争执基本已停止，然而在新闻史研究领域里，关于两大模式的优劣仍不时有争执。^②

笔者无意在此讨论两种模式的优劣，只是私下妄想，能不能将两者的优势和特点结合起来呢？既然史料的无穷性，使得想通过史料重构历史事实不可能实现，那么我们能不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收集资料、核实资料来重构历史，然后再辅以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呢？因此，笔者主张，新闻史人物研究，一方面借鉴“兰克式的、实证主义模式”，注重史料的收集和核实，努力还原人物的人生轨迹；另一方面借鉴“年鉴派的、综合主义的模式”，通过各种途径去解释史料，努力达到不仅要叙述“是什么”，还要分析说明“为什么、有何影响”，即用史料综合阐释人物的内心世界，包括他是如何走上新闻业道路的？他的政治思想、新闻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两者又有无必然的关联？在职业生涯中又碰到过哪些危机？对其事业又有何种影响？

事实上，笔者关于新闻史人物研究的这种思考，早已有学者做过类似的呼吁并付诸实践。例如有学者主张引入职业社会学中的“职业认同”概念，通过对新闻史人物职业动机、情感、态度、认知、身份等认同要素的考察，呈现其从业过程中的动机、追求、情感甚或苦衷。^③类似的还有学者主张采用

① 朱本源：《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两大发展趋势（两大模式）和对它们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载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编《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44页。

② 例如李彬教授认为，为了摆脱新闻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可以借鉴“新史学”的路径，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然而程曼丽教授认为西方“新史学”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片面性，新闻史研究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的同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且要考虑到新闻学学科的具体情况。参见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程曼丽《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③ 参见樊亚平《从历史贡献研究到职业认同研究——新闻史人物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心理传记的研究方法,研究新闻史人物的职业认同产生的历程。^①

二 成舍我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独树一帜的报人

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新闻史中,成舍我无疑是占有重要一席的。正如早在1967年,为庆祝他七十大寿时,一位老报人在一篇文章中所评价的:“摊开民国的新闻史,乃至全部中国新闻史,占据的篇页这么多,又这么丰富,除舍我先生外我还想不出第二人。”^②然而,在大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舍我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地位^③,大陆学术界对他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一直讳莫如深。直到临近逝世,才首先由方汉奇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中关于“成舍我”的条目处作出如下评价:“成舍我从事新闻工作近80年,在评论写作、报业经营管理和新闻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闻界和1949年以来的台湾新闻界有较高的声望和影响。”^④为纪念成舍我100周年诞辰,方汉奇又在《一代报人成舍我》一文中对成舍我的功绩作了较全面的概述,总结了成舍我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创造的五项纪录:从事新闻事业时间最长的人;参与和创办新闻媒体最多的人;为了办报受到挫折最多的人;旧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创办人,和旧中国时期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创办人;中国历史上培养最多的新闻教育机构的创办人。方汉奇又从成舍我是一位“爱国的新闻工作者”“杰出的报业活动家”和“卓越的新闻教育家”三方面对成舍我在中国新闻史中的历史地位作了比较客观全面的论述。^⑤

因此,以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中创造过如此多项纪录的报人为研究

① 例如,陈继静采用心理传记的研究方法,考察了青少年成舍我形成报业家志向的心理过程。见陈继静《从成平到成舍我——一项心理传记的研究》,《新闻春秋》2011年第2期。

② 萧同兹:《老兵不老的成舍我先生》,香港《新闻天地》杂志第1021期,“成舍我七十大寿纪念刊”。

③ 李磊教授认为,大陆地区一直忽视成舍我,是因为“对成舍我的研究,无法绕过国共对峙时期关于新闻史上‘第三条路线’的争议,无法绕过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自由主义现象,无法绕过当时中国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新闻产业化等一系列错综复杂、颇为复杂的学术问题”。见李磊《报人成舍我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新闻出版》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1990年12月版,第57页。

⑤ 方汉奇:《一代报人成舍我》,《新闻学论集》1999年12月版第18辑。

对象无疑是有意义的。首先，从历时的角度，成舍我的新闻活动贯穿了从民国初年至20世纪末近80年的岁月，以其为考察对象，可以观照此间整个媒介环境的变化，可作为一个个案，来反映在不同时代下媒介制度的变迁、新闻理念和新闻业务的嬗变。其次，从共时的角度，成舍我可作为中国近现代民间报人的代表之一，尽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其政治立场有所偏向国民党，但从整体上看，他还是属于中间力量。^①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新闻史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以阶级成分为依据划分的影响，因而对中间力量和资产阶级报人的研究是块有待开垦的荒地。正如方汉奇所指出的，“中间力量的这一部分，还有较大影响。他们同样也是新闻史必须研究的对象，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也应该占有一定的比重”，“在中国现代史上，中间力量是值得研究的。把这个观点用在新闻史的研究上，就是应该加强对中间报刊的研究”。^② 面对国共两党对峙的局面，中间力量是怎样坚持其政治立场，并在国共两党之间周旋的？其最终是怎样破产的？将成舍我及其所创办的报刊作为其中的一个案例来进行分析，有着其他报人所不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实际上，成舍我还有一项纪录，即他是唯一一位在海峡两岸暨香港创办过报纸的报人，因而对成舍我开展研究至少还有两个现实意义。

其一，有利于认识台湾报禁解除后的媒介生态。1988年元旦，我国台湾地区报禁正式解除，7月12日，已届91岁高龄的成舍我创办了《台湾立报》。人们有理由相信，以成舍我之前在大陆辉煌的办报经历，这无疑是他东山再起的一个良机，因而在创办之初，传媒界（包括他本人在内）对《台湾立报》的发展抱有相当高的期望。但是事与愿违，尽管成舍我使出浑身解数，甚至在临终前的病床上仍然召集属下、好友集思广益，为《台湾立报》支招献策，还是摆脱不了它在生死线上徘徊的命运，这成为他此生最后的遗憾。由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何在之前物资缺乏、不

① 例如，老报人顾执中认为成舍我的政治立场还是较中立的，属于中间力量；又如陈建云教授在其著作《向左走 向右走：1949年前后民间报人》中将成舍我作为一个典型的民间报人、中间力量的代表来叙述。参见顾执中《报人生涯》，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页；陈建云《向左走 向右走：1949年前后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230页。

② 辛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访谈录》，《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